

續·乾國

中國名志校注



三水縣誌

孫星衍 撰修
劉敏卓 校注



三秦出版社

K294.14
96
清·乾隆

三水縣志



孙星衍 撰修
刘敏卓 校注
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水县志/ 孙星衍撰修 刘敏卓校注-西安

三秦出版社, 2006. 7

ISBN7-80736-002-X

I. 清·乾隆……II. 三水……III. 刘·校注

IV. Z524. 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34786号

三 水 县 志

孙星衍 撰修

刘敏卓 校注

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

新华书店经销
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31号

邮政编码 710003

排 版 咸阳卓雅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8.50

字 数 120千字

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

200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2000

标准书号 ISBN7-80736-002-X/K. 3

定 价 32.00元

《三水县志》校注序

刘敏卓

秦汉时期，句邑县称为枸邑县。从北魏太延二年(436)起改称三水县，经隋、唐、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，历时 1468 年。民国三年(1914)又因三水县和广东三水县重名，复名枸邑县。1964 年 9 月 10 日，因“枸”字生僻，改名句邑县。

那么，三水县因何而得名？归纳史志记载，有四种说法。一是取汉县旧名。乾隆版《三水县志》多次载明：“三水县后魏置，取汉旧名。”所谓汉县旧名，指北魏时把原安定郡的三水县迁来本境，仍叫三水县。二是因罗川谷三泉并流而得名。《元和郡县志》：“因县界有罗川谷，三泉并流，故以为

号”。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名胜志》、康熙《三水县志》等说法同此。三是因汭河流合玉泉、白马泉、稍泉而得名。《西安府志》：“汭河流合玉泉、白马泉、稍泉，故以名县”。四是因汭河、皇涧、过涧而得名。县人文在中《钜赋》中说：“名则肇于三流，盖指芝川（皇涧）、梁渠（过涧）并县河（汭河）而得名。”《续修陕西通志稿》“以汭水及两涧（皇涧、过涧）为三水名县之由。”

三水有志，肇始于明万历九年（1581），历史上曾八次编修县志，明万历志已经失传。保存下来有康熙志、乾隆志、同治志、光绪志和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的《新志材料》，县人肖芝葆于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续修的《枸邑县志》，仅誊抄五部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失毁，县志办经过多年寻访，于近期才从民间收回，所辑资料弥足珍贵。上世纪末出版的新编《旬邑县志》是第八部志书。

清乾隆《三水县志》是这八部县志中最优秀的一部志书，由孙星衍编修。孙星衍，字渊如、伯渊，号季达、薇隐，江苏阳湖（今常州）人。进士，历官翰林院编修、刑部主事、充沂曹济道、权山东按察

使、山东督粮道。博通经史百家，穷心文字音训之学，精研金石碑版。乾、嘉时著名的考证学家和方志学家。他公余辑志，为旬邑留下了一部系统、完整、成熟的县志。

《三水县志》编修于清乾隆五十年(1785)，全志共4册，11卷14类。本志对古迹古事古人，多与经史相证佐，纠正了以前县志不少讹误之处。行文前引书传为据，后加按语裁定。引证必载出处，裁定慎而不枉，词简事详，有精赅之长，引证充分，具考据学派之风。毕沅在其序文中称赞说：“简而有法”。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、徐家汇藏书楼、西安文史研究馆存有刻本。全志仅10万字，堪称大手笔。该志门类齐全，内容丰富，编排合理，殊可称道，它被列为陕西乃至全国的名志，与康海所修《武功县志》齐名，受到世人的称颂和推崇，亦成为后世修志的典范。

清乾隆《三水县志》可取之处甚多，应该得到后人的重视。四百多年的光阴流逝，孙星衍的著述如同日月，依然放射着它固有的光芒。孙星衍晚年寄居彬州水帘洞，肖芝葆晚年典居县东飞云

洞，《三水县志》的两位主修，相同的心态、志趣现代人似乎难以理解，而在我看来，两位不同时代的老先生选择如此的空山灵水，简直是一种造化。他们临水卧石，得水之长流而不腐，得石之隽永而不谢。日邀闲云为友，看云卷云舒，鸟翔蓝天；夜有青山作伴，听樵夫唱晚，百鸟啼归。如此仙风道骨，天然野趣，芸芸众生，凡夫俗子怎能体会其中的乐趣？他们活得那么随便，那么自在，那么生机盎然，文思如水似云，自然流泻飞逸。

我没有他们那样高洁的志趣，也找不到水帘洞、飞云洞那样的栖身之地。整日蜗居斗室，如苦行之僧，读书作文，苦雨寒窗，灯影相伴，无丝竹之灌耳，有案牍之劳形，于热闹中孤守一方清静，于寂寞处倾听天籁地籁之声。静心校注了孙星衍编修的《三水县志》，追寻的只是心底清静，眼前清明。校注的过程使我体会到世俗的世界变小了，精神的天地却扩大了。

我相信，《三水县志》的校注出版，对于更多的人认识旬邑，了解旬邑，大有裨益；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，深入地了解旬邑的昨天，科学地建设

旬邑的今天,正确地把握旬邑的明天,更是大有裨益;对于广大的史志工作者、爱好者,研究地方志,发展地方志事业也是大有裨益。我相信,《三水县志》校注的出版,一定会使更多的人关心旬邑,热爱旬邑;激励旬邑人民热爱家乡,建设家乡。我自知才疏学浅,点校注释错误难免,恳请方家指正。

2006年6月于旬邑文庙后院

(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史志协会理事、《旬邑县志》主编)

《三水县志》书前

张世民

三水，即今旬邑。其地缘环境，略当于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带，亦为黄河流域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。早在先周时期，这里就蔚成了著名的古豳文化。明代学者文翔凤在《豳易解》中考证：古豳有广、狭之分。“宁州（今甘肃宁县）、真宁（今甘肃正宁）盖北豳，豳之脉；淳化盖南豳，豳之腹；同官（今铜川）、耀州（今铜川市耀州区）盖东豳，豳州（今彬县）、永寿盖西豳，豳之腋；三水盖中豳，豳之腹；而宁州、真宁、三水皆立豳谷中，谷九而原隔错，故谓之豳。”足见古豳文化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，在黄土高原的开发过程中，

曾呈现出一种不断泛化、不断扩张的态势。利用地方志书的特殊形式,来记录这一地域的风土人情、历史掌故和地望特点,无疑具有深远的社会价值和学术意义。

然而,由于历代政区的分合变化,这一区域的史志记载并不完整。较早的有唐代凌准《邠志》,以及后世泛邠州概念下的志书,如《直隶邠州志》等,这些记载固虽真确,却也有普泛之处。例如《直隶邠州志》编于乾隆甲辰(1784年),为知州王朝爵主修,著名学者孙星衍编纂。孙氏为陕西巡抚毕沅的幕府,在毕沅的支持下,他采用唐、宋地理书之体例,搜讨列编,数月而成。其记地理古迹仿诸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长安志》,记人物仿诸《荆录》,共有25卷。初撰四卷,三水、淳化、长武三属县各成一书,故前四卷以三属县为主,自第五卷起专为州志。志以明嘉靖本为据,凡涉及旧事,几乎照抄不易,但列目精细,出处有据。可见其续修志书的方式,是直截了当的。三水县作为邠州三属县之一,也是古豳国的腹心地带,其文化传承乃是相对独立的。《三水县志》作为乾嘉年间的几部名

志之一，因系名人所作，盛世玉成，故而带有鲜明的乾嘉学风和文风，其学术个性也非常突出。

什么是乾嘉学风？它在中国地方志编纂史上有何具体表现？所谓乾嘉学风，其实就是一种以考据、训诂见长的治学方法。因在清乾隆、嘉庆两朝达于极盛，故有此称。此学风秉承西汉古文经学，源深流远，饶具特点。依照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总概括，其特点是以经学为主，以汉儒经注为宗，学风平实、严谨，不尚空谈。然而，在地方志编纂领域，清代史学界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流派：一个是地理学派，一个是史志学派。上述两个学派，分别以著名学者戴震和章学诚为代表，曾在学术圈子内展开过一场地位悬殊的学术论争。其主要话题，在于如何判定地方志的性质与作用，以及用什么观念和方法编史修志等等。戴震重视地方志的地理性，他主张志以考地理，宁信载籍而不信传闻，博考旁稽而轻忽现实；章学诚则强调地方志的历史性，认为方志如古国史，本非地理专门，志横史纵，相得益彰。从名望上说，戴震是学界领袖，引领群伦，其一言九鼎的尊崇地位，使地理学派畅

行一时；而章学诚虽不得志，未能参预四库馆阁，但就编志实践而言，其学术思想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。尽管我们可以说，地理性和历史性是地方志不可偏废的双翼，但是在特定的地域基础之上，人文历史要素的多寡，常常代表着地方志书最起码的实用价值。

乾隆《三水县志》的编纂者，为考据学家孙星衍。孙星衍(1753~1818)，字伯渊，号渊如，江苏阳湖人。乾隆五十二年进士，授编修。官至权山东布政使。去官后，主讲扬州安定、绍兴戢山书院。作为乾嘉年间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，他有自己的的一套治学理念和方法。他一贯坚持朴学研究，强调因器求道，编纂过乾隆《松江府志》、《直隶邠州志》、《鄞州志》和《礼泉县志》等地方志书，同时又受西汉今文经学的影响，重视阐发义理，著有大量的经史文章。他与章学诚同为毕沅的幕府，但其学术观点却迥然不同。在考证沿革、辨析文献方面，孙氏造诣深湛，卓有成绩；但在编志实践方面，却囿于地理一门，未能有大的思想性创新。他主张方志以考据存文献，若无著作好手，不如刻

古志于前，以后来事迹续之，故其编纂的几部志书，基本上都是纂辑性、考证性的，缺乏对经济、社会和原生态文化的鲜活反映。

应该指出的是，地方志书的撰著性和纂辑性，历来是中国地方志编纂中的一个重要命题。明清两代，由于时代思潮和学术风气的差异，在地方志领域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。有人曾将康海《武功县志》和孙星衍《三水县志》加以学术比较，认为两者都是简派志书的楷范，能够以简洁文字囊括一地輿情，但从成书情况来看，两人的学风和文风却是南辕北辙的。可以肯定，康志是撰著性的，而孙志是纂辑性的；康志侧重内容，富有历史眼光，而孙志偏向考证，以辨析文献容身；康志直面社会现实，采撷了大量生动鲜活的地情资讯，而孙志专意铺陈文献，整理了历代政区的沿革资料。就水平而言，前者有思想、有观点，有较高的驾御能力，在著述上略胜一筹；而后者有学问，有眼力，讲究朴实、谨严的方法，在考证上青出于蓝。在这里，我们强调撰著性和纂辑性并行不悖，相互补益，但并非是均衡用力。在续修地方志的过程中，

恐怕更要强调著述创新而非抱残守缺。

就乾隆《三水县志》而言,讲求简约而精要,是一个最基本的治学优长。但就内容而言,它还有几个显著的特点:

从篇目设计上,全书 14 卷,大致可分为两个部类。其中县谱、故城、国乡镇亭堡寨、山属水属、城署关桥坊古址、坛庙寺观墓、兵防、地丁钱粮等,属于地理内容;职官、名人、列女、科贡等,属于人物内容。在地理内容中,既有治城乡镇,山川桥堡,又有坛庙寺观和地丁钱粮,足见其建制沿革是条理明晰的;而在人物内容中,名人传记大多取自正史文献,略加剪裁,取舍任意,显得深度不足。

从内容编排上,编者视地方志为地理沿革考证,宁信文献而不托传闻,但为了阐发一些历史疑案,便于考释,却又以“星衍按”入题,以水系辨山脉,以山水形势考察郡县建置和地理沿革,陈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。与其他乾嘉学者一样,他将志书的编纂纳入考据范畴,并予以爬梳、考辨,无疑增加了历史文献的可信度。其“星衍按”与《资治通鉴》中的“臣光曰”一样,也有某些著述上的闪

光点。

从文风文藻上,编者广泛稽征文学作品,其目的却是为考据服务,辨析它在建置沿革上的参照作用。诸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、《大雅·公刘》乃至《孟子》、《孔丛子》等等,皆在征引考辨之列。在艺文方面,尽管此书与康海《武功县志》接近,使用了分散处理的办法,但他却从未考量其文学价值,也就缺失了相应的思想认识。孙氏文风是一种学术语风,使用的也是考证语气,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语体文、记述体,其文藻理性十足,但感性疏薄,不利于读者诵读。

从著述目的上,编者始终将经世致用作为最高标的,在钩沉文献的同时,坚持采摭事关国计民生的资料,甚至不惜连篇累牍,浓墨重彩。诸如《地丁钱粮》中林逢泰有关减免税赋、减少徭役的多篇奏议,以及其他章节中的相关文献,都与此密切相关。但是,由于编者采摭的档案文献,主要限于明清两代,而且其人物资料,多限于文家、马家等名门世家,所以文献资料的片面性也就非常突出。尽管作者葆有强烈的致用目的和客观的取舍

态度,但实际效果仍然是很有限的。

从历史价值上,我们要给予这部清代县志一个学术定位,就必须研究探索方志编纂与乾嘉学派、考据学风的不同祈向。不少乾嘉学派的名家巨擘,毕生储备了大量历史文献,试图以一己之力修订前史(如乾嘉学者邵晋涵),但是真正派上用场的人其实罕有,因而许多人将修史宏愿化作地方志书的编纂,从而涌现了一大批名家、名志。乾隆《三水县志》堪称是一部名家名志,但名家名志并不等于佳志、良志。究其原因,就在于乾嘉学派的考据文风,并不完全适合地方志的著述性特点。从档案、文牒上说,其较真、工稳的治学方法固然有效,且富于价值,但就反映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真相,展现其时代特点和历史特征而言,其观念上的局限性还是非常突出的。对这部县志在中国地方志编纂史上的作用,我们不应该主观武断,而是要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氛围之中,给予它一个比较恰当的学术定位和价值判断。

新编《旬邑县志》主编刘敏卓先生,在完成新志编纂工作之后,致力于地方风物的研究和地方

文献的整理,并将乾隆《三水县志》纳入了校勘日程,其目的在于扩大志书的发行面,让广大读者有一个阅览赏析的机会,我感觉这是做了一件难得的好事。其于古人的贡献,于今人的博览,于后人的借鉴,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。志书校注完成之后,他嘱咐我写几句学术评论性话语,因我夙奉其业,却之不恭,爰作如是略说。妥否,还望方家批评。

2006年7月10日(农历丙戌六月十五)
于咸阳仲山居

(作者系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、市县志科科长,咸阳市有突出贡献专家、新世纪学术带头人)